

革命领袖的 与时俱进

主编 邢贲思 林建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革命领袖的与时俱进/邢贲思 林建公主编.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9
ISBN 7-220-06115-3

I. 革... II. ①邢...②林... III. 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研究 IV. 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2480 号

GEMING LINGXIU DE YUSHI JUJIN

革命领袖的与时俱进

邢贲思 林建公主编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杨宗平
文小牛
古 蓉
伍登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http://www.bookss.com>
E-mail: sermcbsf @ 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679239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000mm×1400mm 1/32

印 张

13.875

插 页

4

字 数

484 千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220-06115-3/D·784

定 价

22.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革命领袖的与时俱进》

主 编：邢贲思 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求是》杂志原总编辑 教授

副主编：林建公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撰稿人：王锐生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教授

张 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贺翠香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助研 博士生

张启华 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金 钊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编辑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林庭芳 西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目 录

绪 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	(1)
一、与时俱进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本质特征	(1)
二、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3)
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 ...	(5)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9)
 第一篇 与时俱进的马克思	(12)
一、从青年马克思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时代的需要	(13)
二、社会主义理想领域的与时俱进	(27)
三、体现与时俱进的若干理论创新	(40)
四、从与时俱进的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与时俱进 ...	(66)
 第二篇 与时俱进的恩格斯	(72)
一、探索时代课题，不断超越前人	(72)
二、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全面阐述	(91)
三、科学总结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创立马克思主义的 自然观和科学观	(103)
四、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创新和发展	(126)
 第三篇 与时俱进的列宁	(150)
一、社会主义“清醒的计算器”	(150)
二、“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157)

三、首先提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164)
四、从《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到《哲学笔记》的思想升华	(170)
五、对帝国主义的诊断与预测	(180)
六、独创“一国首先胜利论”	(186)
七、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适时转变	(191)
八、晚年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与构想	(199)
 第四篇 与时俱进的毛泽东	(207)
一、创立井冈山道路	(207)
二、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222)
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及此后的发展	(237)
四、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与实践的创造	(250)
五、成功进行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	(260)
六、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268)
七、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281)
八、复杂国际形势中独具特色的外交战略	(288)
 第五篇 与时俱进的邓小平	(307)
一、新社会主义观的创立	(307)
二、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325)
三、理论核心：全新的生产力理论	(336)
四、发展动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	(350)
五、理论标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363)
六、理论主题：社会主义本质论	(369)
 第六篇 与时俱进的江泽民	(384)
一、高扬旗帜，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384)
二、搞好教育，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389)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414)
 后记：与时俱进 永不停顿	林建公 (438)

绪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的科学概括。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具有这样的理论品质？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单纯的学说，而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指导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始终和工人阶级的实践相结合，必须随着工人阶级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必须与时俱进，而决不能墨守成规、保守僵化。因此，创新发展、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之所在，离开了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一、与时俱进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本质特征

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与时俱进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从来不把他们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观点，作出的结论，当作不变的、僵死的东西。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在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曾不止一次地对原有的观点、结论进行补充、修改乃至予以摒弃，因为这些观点、结论由于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已经部分或者完全失效，不作相应的变动，就会对工人阶级的实践造成极大危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革命导师，对历史负责、对工人阶级负责、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负责的崇高品质。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是马克思主义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 19 世纪 40 年代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写出

的，对当时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由于后来情况的变化，《宣言》的某些论断已不合适，必须作出修改。但因为《宣言》是历史性文件，它的本文任何人都无权修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为《宣言》多次再版所写的序言，把必须修改的内容增加了进去，做到既尊重历史，又与时俱进。所以我们学习《宣言》，就必须同时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年代所写的序言，从中可以看到这两位革命导师思想的发展轨迹，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试以 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为例作些分析。1872 年，距《宣言》的发表已近四分之一世纪，在这段时期内，资本主义大工业有了较大发展，与之相应，产业工人的人数也有了较快的增长，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巴黎公社起义，这次起义表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在政治上可以和资产阶级相抗衡的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巴黎公社还是失败了，它的失败证明，工人阶级还缺乏斗争经验，以为利用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公社的这一教训，马克思在公社起义期间写的《法兰西内战》中已经指出，在差不多同时，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也指出，工人阶级不能对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抱有幻想，“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宣言》1872 年德文版对《宣言》本文最重要的一处修改，也正是指出这一点，它说：“由于最近 25 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2]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随着工人阶级实践的发展而修正自己的观点和结论的。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立地担负起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和马克思一样，他也是一位勇于面对现实，在形势变化后，敢于抛弃旧观点、作出新结论的思想家。恩格斯晚年，对工人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策略进行了研究，在去世前不久写成的《〈法兰西阶级〉导言》中他讲到，在较长的时期里，他和马克思对工人阶级斗争的条件、方法的认识有缺陷。他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 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实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他还说：“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

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3]恩格斯对当时在德国出现的以普选权为核心开展斗争的策略很关注，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普选权这种形式工人阶级可以利用，他还说这是德国工人阶级送给“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这说明，恩格斯在晚年已经考虑到了，如果条件允许，工人阶级也可以采取和平的方式夺取政权，暴力革命并不是工人阶级赢得胜利的惟一选择。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就是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把理论正确地运用于实践、又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的一生，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一生。

二、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继承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的时代特征以及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之所以能够开创出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是因为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一种既继承又发展的科学态度，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说过，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想我们应当首先和特别注意这一点。”^[4]列宁不仅这样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

列宁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出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所没有的许多新特点，这就使他在时代特征、革命可能性、革命道路等一系列问题上，得出了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不同的结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首先就表现在他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上。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名著中列宁指出，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已经出现了垄断，形成了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特别是形成了工业垄断资本同银行垄断资本融合而成的金融资本。这种资本对内控制国内市场和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对外奉行侵略扩张政策，掠夺殖民地，瓜分世界领土。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对世界领土的再分配而进行的一场战争。正是在分析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一新的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列宁形成了他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由于国际资本的联合，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取得胜利，各国无产阶级应当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则认为，

在帝国主义时期，情况已发生了变化，由于垄断资本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剧，资本的国际联合已经破裂。同时由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整个帝国主义链条中出现了薄弱环节，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这里取得突破，因此，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俄国当时就是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在俄国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取得成功。列宁的这一论断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正是这一理论指导的结果。

列宁在理论的另一个重大创新，就是他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十月革命后不久，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列宁曾不得不采取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私人贸易，凭证给居民发给工农业产品等。在工业方面则实行集中制，全国一切大中小型企业由国家统一领导。实行这样的政策一方面是迫不得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列宁的一种看法，他认为，这是改造旧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到了1921年春，由于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由于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列宁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提出了在当时情况下发展俄国经济的新思路，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由来。在列宁的倡议下，以俄共（布）十大为标志，执行了三年多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新经济政策所代替。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改余粮收集制为征收粮食税，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在国家的领导和监督下发展商业、调节商品和货币的流通等。这说明，列宁已经放弃了利用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激进的办法来改造城乡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他看到从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能逾越商品经济这个阶段。列宁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5]可以看出，列宁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已发生改变，他已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列宁的晚年，在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还在探索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途径，并且写下了《日记摘录》、《论合作性》、《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五篇被称为政治遗嘱的论文。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是他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总体构想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说明，直到去世前不久，他都一直在探索，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独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列宁的一生是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的一生，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

一生。他的理论遗产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一面伟大的旗帜。

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

20 世纪的中国，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这两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践，并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正确地回答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的领导阶级和同盟军、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等一系列问题，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既非纯粹的殖民地，也非纯粹的封建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革命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这个革命又不是旧的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宣告失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不可能充当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因而这个革命是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整个革命中，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是农民。毛泽东说：“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6]革命同盟军中最重要问题虽是农民问题，但革命同盟军中最复杂的问题则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极富创新精神。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作为剥削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同无产阶级有着尖锐的矛盾；另一方面它又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同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他劳动人民有一定的共同利益。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它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但同时又有严重的动摇性；无产阶级应团结它参加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但又要对它的动摇性保持高度警惕。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也建立起了同盟关系，从而形成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关于中国革命究竟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由于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中国的大城市完全掌握在反动统治阶级手里，通过中心城市起义引

发革命高涨这种欧洲革命的方式根本不适用。而中国的农村幅员广阔，反动势力的统治相对薄弱，革命力量有较充分的回旋余地，而且那里有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无产阶级只有依托农村，建立工农武装，创立红色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才能最后夺取城市。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的独创，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主革命正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逐步走向胜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了一个新的长征——建设新中国的长征。在这个阶段开始时，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原来贫穷落后的国家，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尽管马克思曾预言，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从前资本主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但在此之前毕竟还没有先例。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理论上作出了回答。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不同于列宁的理论，列宁说的过渡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毛泽东说的过渡则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我们用了七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过渡，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使我国从一个原来贫穷落后的国家，逐步发展成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关键是要解决好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正确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是毛泽东的一个突出贡献。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思路是：第一，通过组织起来，把小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引上一条“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安全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对农业的改造不采取苏联集体农庄的形式；第二，通过赎买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正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通过合作化，把数量众多犹如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造最重要的成就。关于对资本家赎买的问题，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曾经提出过，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构想并未付诸实践。毛泽东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和它对待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创造了定息这种特殊的赎买形式。定息是通过允许资本家每年从企业分得一定红利和股息的形式，对资本家逐步进行赎买。正是由于毛泽东创造了这种形式，使得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一项最复杂的任务得以平稳地顺利地顺利完成。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存在着一些

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原来设想社会主义改造需要十五年或更多时间，结果七年就完成了，人为地缩短了过程，造成了较大的后遗症；也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民主主义时期在所制方面没有多大区别，既然这样，何必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岂非多此一举？现在看来，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有些急促，工作有些粗糙，但这不是主流，决不能因此抹煞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成绩，决不能因此否认它当时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从而怀疑它的必要性。应当肯定，过渡时期理论的提出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毛泽东思想新的重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成就。

毛泽东晚年虽然犯了错误，但综观他的一生，开拓创新是他的主流，他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果，永远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毛泽东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严峻的形势。是继续沿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道路走下去，还是既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摒弃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是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重大抉择。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党的领导人，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主张。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鲜明地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并引发了一场“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大是大非之争，它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这场讨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观点的胜利而告终。这就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扫清了思想障碍，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它同时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正是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邓小平提出要对以往的错误，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他指出，我们以往的错误从理论上讲，就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真正搞清楚。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首先就要抓住这个根本问题。正是在系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

形成了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且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引上了一条康庄大道，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就要弄清楚我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的什么阶段上，以及在这个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针对以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清醒，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我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正因为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高，这就决定了我们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去实现工业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一个漫长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犯了主观背离客观、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明确了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有可能明确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才有可能避免重犯那些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以健康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是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

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针对以往我们对生产力的发展一度不够重视，邓小平指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中心工作始终应当放在经济建设上。他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要扭住不放，宁可顽固一点。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其政策选择的根本标准。1992年初，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新经验，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把生产力标准发展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提出判断各方面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把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到这样的地步，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社会主义也要改革的思想。他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思想，是以社会主义必须解放生产力的理论为基础的。解放生产力，按照以往的理解，就是通过革命破除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社会主义不再有解放生产力而只有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但是无论是从苏联，还是从我国的实际看，又确实存在着生产力受束缚而需要进一步解放的情况。这种束缚不是来自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是来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指出体制障碍这一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症结，提出改革现行经济体制是现阶段解

放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高度评价改革的意义，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是第二次革命。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是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部分。

社会主义必须改革，那么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邓小平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计划经济必然同社会主义相联系，而市场经济则必然同资本主义相联系。邓小平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手段。既然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手段，那么，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这就为我们确立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正是以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为基础，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我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找到了一种体制上的保证。

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观点，对于全党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同时也把科学社会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党的十五大报告高度评价邓小平理论，指出：“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放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面旗帜的指引下，社会主义终于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向全世界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有无限生命的，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责任，历史地落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肩上。为了使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停顿，首先在理论上要有创新，正如江泽民同志 2002 年 5 月 31 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讲

话中所指出的：“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就是说，必须根据新的实践，新的情况，提出能够反映当代世界和中国变化的党和国家工作的新思路，提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新方略。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那么，在当代，国际和国内形势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新变化？国际方面：和平和发展仍是世界的主流，但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并不太平；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进入 21 世纪，我国面临更加严重的挑战。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国内方面：我们党执政已逾半个世纪，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广大人民群众殷切地希望我们党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继续带领他们前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前途，人民的期望，同样要求我们党必须提出与以往不同的、适应形势发展的党和国家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就是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三个代表”的论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当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但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承担着建设国家的任务，肩负着人民群众的希望，因此就不能不把党的建设和党的执政地位结合起来加以考虑，不能不把党的建设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向我们提出的要求结合起来加以考虑。“三个代表”不是单纯的党建理论，而是立党和执政兴国二者统一的崭新的理论。这正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之处。江泽民同志对“三个代表”内容的论述，从高州讲话，到 2001 年“七一”讲话，再到这次“5.31”讲话，可以说是步步深入，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否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系到党的建设的成败得失，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所以江泽民同志说：“‘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全党“一定要坚持把全面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统一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统一于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在“5.31”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强调：“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一论断十

分深刻。所谓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是说，全党必须解放思想，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来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所谓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是说，全党必须深刻理解，保持党的先进性，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世界上有的执政时间很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党，由于丧失了先进性，也就丧失自己的执政地位甚至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在当代中国，党的先进性“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实际作用”。所谓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是说，全党必须永远牢记，一切为人民，既是我们党立党的宗旨，也是我们党执政的目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三个代表”是不可分割的，但一切为人民是它最后的归结点。就是说，我们发展先进生产力也好，发展先进文化也好，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要承担起执政兴国、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江泽民同志为全党做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表率。

注 释：

- [1] 《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1页。
- [2] 《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10、521页。
- [4] 列宁：《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报告》，《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19页。
- [5] 《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88页。
- [6]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3～644页。

第一篇 与时俱进的马克思

在一本论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书中，阐述我们的领袖人物如何在理论问题上与时俱进固然是很有必要，但是其最终目的还是要达到使读此书的人真正接受这样一种理念——把与时俱进看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必备的理论品质。因此相对于后者（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来说，前者（马克思如何与时俱进）是手段，后者才是我们的目的。

既然如此，领袖人物在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就没有必要事无大小都一一列举。不列举，固然不足以说明问题，但列举哪些，应当服从于说明本书的目的——有助于人们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至于着重把握哪些“与时俱进”，我认为福柯说得好，“思想发展中最真的东西，恰恰是话语的断裂、话语布展的边界和理论逻辑中独特的异质性。”^[1]因此，为了把握住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最值得注意的“与时俱进”，就应当注意其发展进程中的非连续性。

上述想法使本章的作者在确定“与时俱进的马克思”的写作框架时给自己规定这样的要求：既不是写整个马克思的思想史，也不是写马克思的生平和他的全部理论贡献，而是从与时俱进的独特视角向读者介绍马克思理论生涯中那些最能体现这一理论品质的事迹与问题。

在这一视域下，不可避免地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在论与史的关系上，“与时俱进”一词很容易使人把这个题目写成“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这就失去存在的价值。因为此类的书太多了。其实，论与史应当统一在揭示马克思如何在理论创新上达到与时俱进。既不应单纯列举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也不应去写另一本马克思的思想史。二、与时俱进对于马克思来说，决非单指思想观念不落后于时代，而是首先要把握时代的先声——在旧时代即将过去，新时代即将到来的前夕预言：旧时代必将崩溃，新时代必将胜利。仅仅